

# 新媒体在“太阳花学运”中的动员与支持作用

信 强<sup>1 2</sup> 金九汎<sup>3</sup>

(1.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3.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2014年3月18日, 台湾部分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学生占领“立法院”, 从而引发震动全岛的“太阳花学运”。学运组织者和参与者广泛利用新媒体传播工具来发布和散播反对意见, 建构反服贸集体意识, 建立学运运动员网络, 获取国际支持, 筹措行动资源, 支持各项行动的组织和管理, 对于学运的发动和开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首先阐述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及其社会应用, 继而着重对新媒体在此次学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分析, 最后探讨新媒体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

**关键词:** 新媒体; 社会运动; 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太阳花学运”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4)06-0016-09

2013年6月21日, 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以下简称“服贸”), 向两岸经济的相互开放与整合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 尽管马英九当局一再强调, 协议的签订将对台湾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 却遭到台湾岛内部分人士的质疑与反对, 并引发了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社会运动。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次学运过程中, 以 Facebook、Youtube 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媒体对于运动的动员、发起、组织以及管理发挥了十分显著而独特的作用。通过对新媒体的娴熟运用, 学运组织者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关于服贸的负面信息, 强化公众对于服贸的片面认知, 推动了反服贸集体意识的形成, 并且建构起一个强大的动员和组织网络。与此同时, 新媒体还被学运组织者广泛地用于资金的筹措、资源的积累以及运动秩序的管理和维持, 从而得以更加有效、持久地展开抗争活动。

## 一、新媒体的特性及其在社会运动中的应用

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 为人类开启了信息时代的大门, 也导致以 Facebook、Twitter、Skype 和 Youtube 为典型代表的“新媒体”(New Media) 的出现和普及。在数字网络时代的背景下, 与电视、报刊和广播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台湾地方政治生态发展变迁研究”(14BZZ074);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研究”(12JJD810011)

**作者简介:** 信 强, 男,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九汎, 男,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

等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介质和平台凭借其所具有的一系列特殊属性,得以在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就其内涵而言,“新媒体”本身是一个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而处于不断演变之中的概念。所谓的“新”自然是相对于“旧”而言,例如广播相对报纸而言是“新”媒体,电视相对广播而言是“新”媒体,而网络相对电视而言也是“新”媒体。本文所讨论的“新媒体”则是指当前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并且其功能发挥深受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影响的传播媒介之总和。<sup>[1]</sup>较之于报纸、期刊、电台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数字化“新媒体”主要具有以下几项显著特点:

第一是互动性。与相对“单向度”的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可以让传播者和接受者融汇成对等的交流者,并且使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的交流。<sup>[2]</sup>借助网络和各种个人电脑终端,新媒体用户之间能迅速地互相交流信息与意见,达成信息流的双向传播,而实时与多元的特性更加强了新媒体的互动性。以 Facebook 为例,除了透过文字之外,只要对于某个发言或是图像按一个“赞”(Like)或“分享”(Share)的按钮,用户就能表达他的基本意见,并且将相关的信息立即自动发布到他的网络社群。

第二是即时性。与终端设备的普及化与移动化相配合,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使得海量信息能于任何计算机网络存在的地方得到即时的收发和传播。与此同时,相对低廉的通讯费用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普及,使得新媒体能够以远低于传统媒体成本的方式,更加轻易和便捷地实现信息的广泛乃至全球化传播。

第三是去中心性。相对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传播方式,新媒体能实现平面的、“多对多”的传播方式,使发言权更加平等,话语权更加分散,甚至一定程度上形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由于“原本作为观众的人可以运用他们手中的媒体工具来互相传达信息”,由此导致了“公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的产生。换言之,透过新媒体平台,任何人都可以扮演传统媒体的角色进行大众传播,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公民新闻业”(citizen journalism)的出现使得信息的提供更趋个性化和多元化。<sup>[3]</sup>

第四是超媒体(Hypermedia)特性。新媒体结合了超文本(hypertext)与多媒体的特性,能够以非线性的网状结构,结合影像、声音、图片、文字等多元的信息形式,进行巨量、复杂、多样信息的收发和传播。超媒体的特性使得新媒体用户能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去获得共同的信息资源,并再次将资源共享出去,形成大范围的信息共享网络。

第五是社群化功能。透过新媒体平台,用户能够基于相近或共同的兴趣、理念和目标而在网络上形成平面与自由的虚拟社区。由于去中心化与匿名性的特性,新媒体能形成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平面的虚拟环境。在这个虚拟空间中,用户能跨越真实社会的身份、族群、等级、阶级等各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弱势群体可借此获得与强势群体几乎同等的话语权。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大量基于网络和个人电脑终端的新媒体信息传播工具的开发利用,新媒体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4]</sup>例如近年来席卷中东和北非,并导致多个政权倒台和剧烈社会动荡的“阿拉伯之春”,便由于新媒体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巨大效能,故而甚至被称为“Facebook 革命”或是“Twitter 革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媒体能够使政治和社会运动一定程度上突破甚至超越空间、时间与成本的限制,用以发起和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以支持运动的持续展开。<sup>[5]</sup>具体而言,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可以划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建构信息网络将议题认知普及化,刺激社会情绪与集体意识的形成。新媒体使得为数众多的用户之间能够建立起信息量大、覆盖范围广的“弱连接网络”(weak ties network)。<sup>[6]</sup>在这一网络中,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信息节点、传播者和参与者,通过广泛地建立“弱连接”,使用户自身的社交网络规模迅速扩大。新媒体用户由此可以接触到日常所无法得到的信息,使得普通民众能便捷

地知晓重大社会议题,并随之让某种特定的集体意识能够被迅速且广泛地传播。此外,新媒体的去中心性、社群化功能以及实时性特性,使其可以建构起一个比传统的公共领域更为巨大、开放、平面化的公共空间。在这一虚拟的社会空间中,新媒体用户之间可以展开实时、开放、多元的社会互动,加之参与者的数量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从而令巨量用户之间集体意识的凝聚成为可能,也使得社会运动被组织以及新媒体用户被动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sup>[7]</sup>

第二,进行自主发声。新媒体为社会运动的组织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媒体限制的渠道。借助新媒体传播工具,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以绕过传统媒体自身设置的“把关机制”(gatekeeping),获得独立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sup>[8]</sup>此外,新媒体的实时性使其往往能抢在传统媒体之前发布信息,成为第一手信息和数据的提供者并被传统媒体加以采用,从而形成更广泛与多层次的传播。例如,2010年6月28岁的埃及青年卡勒德·赛义德(Khaled Said)在首都开罗被两名警察殴打致死。虽然警方事后声称,赛义德是由于吞下一包大麻而导致死亡,但是由于死者被殴打至扭曲的脸部照片被手机拍摄并发布至网络,使得警察的辩辞不攻自破。此后埃及多家主流电视台和报刊对此事进行了大量转载和跟踪调查,因该事件而引发的社会不满最终成为了埃及革命的催化剂。<sup>[9]</sup>

第三,推动社会动员。获知社会运动的时间、地点、内容的信息是任何人要参与社会运动所需满足的前提条件,因此能提供社会运动相关信息的“动员中介人”(recruitment agents)在动员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网络的联结作用使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信息节点、被动员的对象甚至动员中介人,使得被动员的目标庞大且广泛。此外,通过新媒体平台所创设的虚拟社群,能让关注某个共同社会议题的个体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形成或激化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意识结构,从而催生所谓的“网络行动主义”(Cyberactivism)。<sup>[10]</sup>与之相应,网络行动主义的形成又会使上述对抗性的意识结构得到固化,并赋予其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正义感,促使个体为“集体利益”而采取行动。一旦条件成熟,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言论便会发展和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行为,亦即由“线上”转为“线下”(Online to Offline),推动社会组织的成立,甚至社会运动的发起。<sup>[11]</sup>

例如2009年5月,危地马拉律师罗德里戈·罗森伯格(Rodrigo Rosenberg)指控该国总统阿尔瓦罗·科罗姆(Alvaro Colom)试图谋杀他的影片在网络上被公开。随后,大量相关的Facebook社群被创建,群体内各种意见的抒发与交流开始凝聚成反政府集体意识,网络成员以Facebook社群为基础积极呼吁和组织社会抗争行动,最终引爆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对政府的行为予以声讨和谴责。<sup>[12]</sup>

第四,形成互助网络。借助新媒体网络,社会运动的相关信息能够实现跨国界、跨地域乃至全球性的传播,以促进外界对于社会运动的了解和认知。新媒体的特性使其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拥有共同利益与理念的个体与组织进行互相链接,使得社会运动支持群体的规模能够迅速扩大,建构起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虚拟社群。社群中的成员彼此同情,互相支持,展开跨国界甚至跨地区的合作,建立起广泛的互助网络,从而推动形成无论规模抑或是影响力均远为巨大的社会运动。例如,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女权团体便成功地通过新媒体平台跨越国界的障碍,与海外移民群体中的女性展开互动与合作,建构起一个全球性的女性互助网络——“跨国女权主义者网络”(Transnational Feminist Networks)。<sup>[13]</sup>

第五,筹集资金和获取资源以支持运动的进行。借助新媒体传播工具所形成的互动网络,社会运动组织能广泛地与外界进行联系互动,进而及时高效地募集所需的物资与资金。与此同时,外界支持社会运动的人士则能够通过电子商务系统,以简便快捷的方式实现资金的跨国界、跨地域输送。此外,利用新媒体互助网络提供的技术性支持,用户之间还能互相交流经验,实时探讨如何开展社会运动。例如在2011年爆发的埃及革命中,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便根据自身的经验,透过Facebook和Twitter等新媒体,指导埃及的“革命人士”应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开展抗争行动,包括如何筹集

资金 在何种时间段举行集会较为安全 ,以及如何争取国际同情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等。<sup>[14]</sup>

## 二、新媒体在“太阳花学运”中的作用与影响

2013年6月21日,两岸两会举行第九次高层会谈,并正式签订了服务贸易协议。然而台湾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却使得服贸甫经签署,便遭遇诸多非议和指责。在政治上,马英九当局低迷的支持率,加之岛内“台独意识”的回潮和民进党的恶意操弄,导致部分民众对马英九推动两岸经贸合作的举措心存疑虑,引发了对于大陆“以经促统”的担忧。尤为重要的是,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乏力,低薪资、高失业、高房价等因素使得以年轻人为主的普通民众倍感压力,担心服贸的签署将会使上述情况更趋恶化。例如根据“新台湾国策智库”的调查显示,57.4%的民众担心服贸会使得自己或家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其中20-29岁年龄层的高达64%,比例为各年龄层中最高。<sup>[15]</sup>服贸的签定导致大量年轻民众对于就业与产业发展前景充满忧惧,并最终引发了所谓的“太阳花学运”。而在这场学运的发起、组织和运行过程中,新媒体则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 1. 建立信息网络和在线群体,促进反服贸集体意识的形成与发酵

在服贸协议签署之后,岛内部分社会组织随即开始展开反服贸活动,形成了以“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与“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为骨干的多个反服贸团体,并积极运用新媒体科技来传播反服贸信息,组织反服贸游行与讲座,以此来促进和固化社会大众对于服贸的负面认知。<sup>[16]</sup>林飞帆、陈为廷和黄国昌等人所发表的一系列反服贸意见与观点,在Facebook、大型网络论坛“批踢踢实业坊”(PTT)等新媒体社交平台上被大量转发,并引起广泛讨论和传播。例如,反服贸人士首先通过“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与“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的Facebook粉丝页,连篇累牍地发布反对公告与抗议信息,然后透过Facebook的“赞”与“转载”的分享机制,使得上述信息得以借助1500万的Facebook用户在岛内迅速流转。又如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郑秀玲组建名为“郑秀玲等学者服贸解密团体”的Facebook社群,并且发布了一系列“服贸自救宝典”简报。而为了让上述反服贸信息能更方便的传播,这些简报又被加工浓缩,制成了所谓的“懒人包”。在新媒体的助力下,这些宣扬服贸将“损害国家安全”、“破坏民主”、“造成贸易不平等”的信息材料被大量复制并在网络上流传,被许多人当成认识服贸的权威参考材料,进而深刻影响了岛内部分民众对于服贸的认知。

新媒体的特性使得反服贸人士不仅可以透过强连接网络将信息分享至周边人士,更可以透过弱连接网络将大量信息迅速分享至理论上无限广泛的新媒体用户,从而形成一个强与弱连接交错的超大型信息交换和传播网络,使其对服贸的负面认知能够以网状的方式迅速向社会大众普及。而这些信息通过累积大量的“赞”以及被频繁的转载之后,充斥着网络媒体空间,一定程度上甚至被当做主流和权威观点得到认可,发挥某种议题设定的效果。在反服贸人士的引导之下,普通民众对于服贸的错误认知逐渐建立并固化,导致以怀疑和恐慌为特征的“反服贸集体意识”的形成和发酵,萌生出所谓的“保护国家”、“维护民主”的“社会责任感”,最终为反服贸运动的动员和组织奠定了心理基础。

### 2. 形成庞大的动员网络,直接引发“太阳花学运”

2014年3月17日,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以30秒时间宣布完成“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备查案,使得社会不满达到高点。“黑色岛国青年阵线”随即于当天在Facebook发布了“服贸协议粗暴闯关 人民包围立法院!”的信息,号召民众在3月18日包围“立法院”。18日,各路反服贸人士与团体开始聚集于“立法院”外,展开所谓的“守护民主之夜”抗议活动。当日凌晨,一群学生越过围墙冲进并占据“立法院”。学生们随即在Facebook公共网页上发出占领声明稿,号召民众一齐施压,要求马英九亲自至“立法院”进行回应,为时24天的“太阳花学运”就此拉开序幕。

随着事态的升级,与反服贸相关的信息与交流活动迅速增加与扩散。学生在冲进“立法院”内后

开始架设起影像直播平台“Ustream”,透过一个 Ipad 向院外民众就院内状况进行直播,并引发了百万民众在线观看与讨论。以 Facebook 为主,反服贸组织与人士的网页成为相关信息发布的重要平台,并且成为热门的社会对话空间而获得大量的浏览和关注。透过新媒体,对于服贸的不满情绪被急剧放大和广泛传播,而为了争取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学运,学运组织者开始利用新媒体扮演“动员中介人”的角色, Youtube、Facebook 等网络媒体平台陆续出现大量动员号召、活动具体时间与地点、参与学运的方式等相关信息,使得此前的信息网络逐渐演变成一个巨大的动员网络。

例如根据台北大学社会学系所做的调查,在“太阳花学运”现场有 58.6% 的参与者认为 Facebook 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将 Facebook 列入信息来源的人员比例达调查样本的 87.3%,网络新闻为 71.5%,PTT 为 53.7%,电视媒体则为 43.8%。<sup>[17]</sup>在学运开始后仅一周时间,就有 35 万名粉丝加入“反黑箱服贸协议”的 Facebook 社群,“反黑箱服贸协议”发布的声明则被迅速转载与分享,传达到接近二成的台湾人口(430 万人)。而“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所发布的信息也往往在 Facebook 上被转载达数千次之多。<sup>[18]</sup>在占领“立法院”后,学运组织者利用新媒体“呼朋引伴”,导致愈来愈多的支持者被动员起来,聚集在“立法院”外声援院内的学生。截至 3 月 21 日的 11 点,人数已达 2.8 万之多。

此外,新媒体所形成的虚拟社区也启动了在线组织动员,进而展开线下社会行动。其中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学运支持者透过大型论坛 PTT 所发起的“乡民团”动员。<sup>[19]</sup>占领“立法院”事件爆发后,PTT 上开始出现大型的动员号召,透过网络招集免费的游览车,并组织台中、高雄等中南部县市的学运支持者前往台北。3 月 30 日 50 辆满载各地学生的游览车抵达学运现场,并随后开始在各处插上“PTT 乡民团”的旗帜。根据岛内媒体估计,参与学运的“乡民”人数高达近 10 万之众。<sup>[20]</sup>新媒体提供的互助网络还扩大了社会大众参与动员的机会。例如在“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 Facebook 上,便张贴了一位陈姓女士为在香港的台湾学生回台支持学运提供机票费用的信息,以资助岛外学生返台参与学运。诚如学运组织者之一陈为廷所言:“这个世代组织方式跟野百合学运(1990 年)的差异,在于我们会用 Facebook 动员网络,有点像是网络上元子化的个人。过去学运仰赖各大学在校园里组织动员,现在完全不用,只需要发一个活动页,所有人就可以自动来到现场,大家就在现场就地组织。”<sup>[21]</sup>事实证明,各种新媒体工具既是学运组织者进行动员的主要手段,也是被动员参与学运的民众获取活动信息的主要途径。正是在新媒体的助力之下,学运的组织者得以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动员网络。

### 3. 利用新媒体达成自主发声

对新媒体的娴熟应用,使得学运拥有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发声平台。大批学运参与者承担起“公民记者”的角色,自行组建新闻工作小组,编写有利于学运的信息,并进行广泛且几乎无成本的传播。例如,台湾大学新闻所的学生联合岛内多所高校学生所组成的工作小组“台大新闻 E 论坛”便是学运中自媒体的一个代表,该群组成员以社交应用软件 Line 互相联络与审稿,每日能发布数十条新闻至 Facebook 的群组网页上。<sup>[22]</sup>

此外,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特质令学运组织者能够越过传统媒体的“把关机制”,得以几乎不受限制地批评和指责行政当局,充分表达学运的要求和主张,展开对学运的正面宣传,同时反驳和抵制不利于学运的信息。例如在学运过程中,一些媒体批评部分学生的所作所为形同“暴民”,并且客观地指出参与学运有碍学业完成、扰乱公共秩序等问题。针对这些负面信息,学运组织者随即积极利用新媒体来“自我”塑造其“和平理性抗争”的形象,例如在占领“立法院”后,便有学生运用具有在线直播功能的 Ustream 向外界“实况转播”学生在“立法院”内遵守和保持秩序的画面,以此证明并未发生严重的破坏性行为。

3 月 23 日,上百名学生与民众包围台湾“行政院”,随后又突破警戒“占领行政院”。行政当局被迫在数小时后开始采取“强制驱离”行动,并导致数名学运参与者受伤与送医。尽管警方在行动之前特意驱散了在场的新闻媒体,以避免驱离画面与景象被曝光,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是抗议学生利用

随身携带的新媒体移动终端,拍摄了大量的现场警察实施武力驱逐的照片和录像,并迅速上传至 Facebook、Youtube 等网络平台,从而为公众所知晓,并被诸多新闻媒体所广泛采用和转载,从而树立起学生的“受害者”形象。

#### 4. 组织全球互助与支持网络

为了吸引国际的关注与支持,并且借此向台湾当局施压,学运组织者还积极运用新媒体,推动“太阳花学运”的全球化。例如参与反服贸的学生组成了 35 人的翻译团队,将学运相关主张与信息翻译成 30 种语言,透过新媒体以数字化的方式上传至国际互联网。数名工程技术人员与翻译人员合作,在一天内制作完成了“太阳花学运”的英文网站“4am.tw”,随后学生们透过新媒体终端与社交平台将学运的相关图像和影片等信息在“4am.tw”上予以发布。此外,反服贸学生还通过热门公共论坛“热迪特”(Reddit)的“有问必答”(ask me anything)版面发起了网上即时对话。<sup>[23]</sup>在这个版面上,学运骨干陈为廷等人可与全球大量用户可以进行有关学运的直接交流,并回答来自各方的问题。<sup>[24]</sup>

新媒体为全球各地关注学运的人士提供了了解学运的渠道,也为学运争取到了一定的支持与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互助网络,使得“反服贸集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扩散到了全球。例如 3 月 27 日,林飞帆针对行政当局的驱离行动,号召学运参与者在 3 月 30 日携带太阳花举行游行,并占领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和中山南路等路段,这一动员信息随即被迅速传播到全世界 16 个国家的 45 个城市。28 日,香港的“守护台湾青年阵线”通过 Facebook,号召香港与全球的台湾学生在同日声援“330 反服贸游行”。而由台湾海外留学生组成的“海外留学生声援台湾反服贸运动”也通过 Facebook 发起了“3 月 30 日全球时差接力大游行声援台湾反黑箱服贸运动”,在该组织的规划与协调下,日、德、法、英、澳、加拿大等国的台湾留学生在各地举行了海外版的“330 反服贸游行”,对岛内学运进行声援。更有甚者,一群海外留学生还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所谓的“反对两岸签署服贸协议的请愿案”联署活动,希望能够在一个月内收集 10 万人联署,以争取奥巴马政府对请愿案做出回应。随后,支持者开始大量转贴相关信息,甚至制作了如何进行联署的教学视频在网络上公布,以争取海内外反服贸的民众进行联署投票。

#### 5. 资源筹措与统筹管理,支持学运进行

新媒体在学运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资金、人力、物力等资源的筹措和管理,使得旷日持久、耗费巨大的学运得以开展和维持。例如学运组织者以新媒体为平台建构了资源互助网络,用于募集资金与物资。而在新媒体以及现代电子商务系统的帮助下,支持学运的人士则可以迅速且不受地理限制地向学运提供资金与物资支持。例如 3 月 24 日“行政院”驱离事件发生之后,部分学运参与者开始在台湾热门的网络募款平台“FlyingV”发起募款号召,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就得到了 3 621 位人士的捐款,募集款项高达 633 万新台币。利用募集的巨额资金,学运支持者甚至购买了《苹果日报》的头版广告与《纽约时报》国际版的广告版面,用来刊登“太阳花学运”与“行政院驱离事件”。

新媒体还被广泛用于学运的组织管理、人员调配以及秩序维持等方面的工作。例如,借助 Hackpad 与 Hackfoldr 的共同笔记(Collaborative Writing)应用,学生能够轻松地进行工作分配和各种物资的调配。<sup>[25]</sup>学运所建立的物资组可以利用共同笔记向外界公布学运所需物资清单,当有支持者购买了相关物资之后,就会将物资运送至学运场地,由物资组进行统一分配,支撑学运的进行。

又如为了延续对“立法院”的长期占领,学运参与者开发出一个名为“反服贸立法院 Facebook 好友排班表”的排班软件。利用这一软件,学生能够透过 Facebook 与其好友相互确认排班的状况,并做出更为精准的轮换值班规划,防止在“立法院”现场的人员过多或过少。还有学生运用地图编辑软件“谷歌地图引擎”(Google Maps Engine)制作了“占领立法院地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或其它移动终端进入这一在线地图,以了解附近的便利商店、卫生间、媒体以及物资集散点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与移动化终端的结合,使得学运组织者能够通过新媒体工具发出指令,而散布于各处的参与

者则能实时地接收到指令,并迅即做出集体反应,使得学运能够以相对统一的步调开展和运行。

### 三、新媒体的局限性及反思

2014年4月6日,台湾当局“立法院长”王金平出面承诺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会召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从而部分地满足了学生的要求。10日学生撤离“立法院”,“太阳花学运”就此告一段落。在此次学运中,新媒体为学运组织者提供了空前强大的话语权,也对学运的动员、组织和展开起到了重要而且独特的推动作用。在未来,随着信息科技的持续发展,信息传播手段和平台的日益普及,新媒体势必会在各种抗争行动频发的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关注和重视新媒体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媒体仍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不应该过分夸大或是无限拔高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功能和价值。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进行自媒体的人士通常并未接受过良好的新闻从业训练,也较少受到新闻基本原则和从业道德的约束,使得其所采集和传播信息的质量往往缺乏保证。例如在学运过程中,很多参与者所发布的关于服贸的信息均源自于内容高度浓缩、客观性严重不足的“懒人包”,而且根据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对于服贸内容的了解程度时,65.7%的参与学运的学生承认只是“一知半解”,对服贸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台湾经济的利弊影响其实所知十分肤浅。此外,学生所发布的信息往往夹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好恶,对数据来源也缺乏甄别的能力,甚至许多信息和数据事后被证明纯系谣言。

第二,新媒体“多对多”的实时传播方式导致难以对信息的发布进行管控,信息发布者的“自主性”使得对学运有利和不利信息交错出现,组织者亦无法完全预防和过滤有损学运形象的信息的传播。例如3月19日,有三名学生在“立法院”内饮酒并自行将图像信息发布至Facebook上,立即引起各方的广泛批评,也导致民众对参与学运的学生的好感度降低。3月20日,又有支持服贸的人士在PTT论坛上发帖,谎称在反服贸集会现场安装了炸弹,结果造成了民众的恐慌。

第三,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往往十分零碎,片面追求“短平快”以及搏人眼球的轰动效应,因此很难对某个重大事件展开完整系统的论述。例如对于两岸服贸协议这一事关岛内经济民生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议题,仅仅依赖新媒体上所发布和传播的片段化且过于杂乱的信息,显然无法对其全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和准确的认知和把握,进而导致这一对台湾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协定迟迟无法得到批准。

第四,虽然新媒体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平等和公平的参与权与话语权,但事实上,许多同样运用新媒体的群体和个人的意见并无法得到同样的重视。例如在此次学运中,部分学生便由于不满话语权过度集中于少数学运领导者,愤而组成了所谓的“贱民解放区”,并明确声称“在行动现场,虽然我们积极现/献身,我们却没有参与共同决议的权利/力,使得这场运动看似集体共享,实际上所有事情却还是一如往常地透过少数决策者来领导、发落。”<sup>[26]</sup>此外,新媒体的互动性不仅使得在网络社群上支持服贸的用户受到占多数的反服贸用户的言辞攻击,沦为“弱势群体”,甚至令学运参与者中许多对反服贸态度较为温和理性的学生也遭遇“语言暴力”,其意见和建议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尊重。

第五,在考察新媒体的作用时必须避免“新媒体决定论”,不应刻意夸大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而忽视和贬低传统媒体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根据“AGB 尼尔森媒体研究”(AGB Nielsen)所做的调查,在学运期间,电视新闻频道平均收视率大幅增长了35.5%,表明传统媒体依然是民众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新媒体无法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媒体的功能。<sup>[27]</sup>调查数据显示,年龄层越低,则越倚赖新媒体;而年龄层越高,透过传统媒体了解太阳花学运的比例则愈高。<sup>[28]</sup>此外,在这次学运中还可以看到大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辅相成,紧密互动的例证。例如,大量的传统媒体将新媒体所提供

的实时信息作为新闻素材,从而将学运的信息传递给较少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民众。而在4月1日,学运骨干之一林飞帆则借助网络通讯软件 Skype,在不离开学运现场的情况下与半岛电视台进行了实时连线直播,借以向国际社会宣传“太阳花学运”。

#### 四、结 论

与岛内此前的多次政治和社会运动相比,“太阳花学运”发生在新媒体终端设备的普及化与移动化的时代。审视此次学运,可以发现多种新媒体信息传播工具和平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 Facebook、PTT、Youtube 等新媒体工具,反服贸人士首先得以建构起一个广泛的信息互动网络,借以自主地表达立场,发布主张,散播信息,进而推动反服贸集体意识的凝聚和形成,为学运的爆发创造了条件。而在学运开始之后,这一信息网络又成为学运组织者发动大规模动员,进行组织和管理,筹集资金物资,争取国际支持的平台,从而使学运得以持久开展和进行,最终迫使台湾当局做出了重大让步。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势必会在岛内未来的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日益复杂和重要的角色,对此值得我们予以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注释:

- [1] 参见景东、苏宝华《新媒体定义新论》,《新闻界》2008年第3期;熊澄宇《整合传媒:新媒体进行时》,《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廖祥忠,《何为新媒体?》,《现代传播双月刊》2008年第5期。
- [2] Vin Crosbie, “What is New Media?”, January 1, 2002, <http://www.sociology.org.uk/as4mm3a.doc>
- [3] Seth Lewis, Kelly Kaufhold & Dominic Lasorsa, “Thinking About Citizen Journalism – The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for Community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2009, Vol. 4, No. 2, pp. 163–179.
- [4] Lauren Langman, “From Virtual Public Spheres to Global Justice: A Critical Theory of Interworke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2005, Vol. 23, No. 1, pp. 42–74; Della Porta & Lorenzo Mosca, “Global-net for Global Movements? A Network of Networks for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005, Vol. 25, No. 1, pp. 165–190; Shannon O’ Lear, “Networks of Engagement: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nd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Kaliningrad”, *Human Geography*, 1999, Vol. 81, No. 3, pp. 165–178.
- [5] Manuel Castells,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effery Juris, “The New Digital Media and Activist Networking within Anti-corporate Globalization Movemen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5, Vol. 597, No. 1, pp. 89–208.
- [6] “弱连接”(weak ties)为相对于“强连接”(strong ties)的概念。后者是由信任、亲密感、尊重等要素组成的关系,通常见于朋友、亲人之中;弱连接的关系中则缺乏强连接的以上要素,通常见于陌生人、客人、朋友的朋友等关系中。可参见 Mark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Vol. 78, No. 6, pp. 1360–1380.
- [7] Clay Shirky,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1,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038/clay-shirky/the-political-power-of-social-media>
- [8] “把关机制”理论由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该理论认为在信息的流动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机制”,原始信息必须根据所设定的规范与价值,将信息过滤与筛选后才能进入传播渠道。
- [9] Kareem Fahim, “Death in Police Encounter Stirs Calls for Change in Egyp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7/19/world/middleeast/19abuse.html?pagewanted=all&r=0>
- [10] Charles Berge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Don Stacks & Michael Salwen (E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9, pp. 260–279;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Virtual and Re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0, Vol. 3, No. 3, pp. 386–401.
- [11] Michlene Wojcieszak, “Carrying Online Participation Offline: Mobilization by Radical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ly Dissimilar Offline T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 Vol. 59, No. 3, pp. 564–586.
- [12] Summer Harlow,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Facebook and an Online Guatemalan Justice Movement That Moved Offline”, *New Media Society*, 2012, Vol. 12, No. 2, pp. 225–243.
- [13] Valentine Moghadam, “Transnational Feminist Networks: Collective Action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0, Vol. 15, No. 1, pp. 57–84.



- [14] Nahed Eltanawy , Julie Wiest, "Social Media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2011 , Vol. 5 , Feature 1207-1224.
- [15] 吴荣义 《从民调数字看学运反〈服贸协议〉》, “台湾思想坦克”2013 年 4 月号 ,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page/chinese\\_attachment\\_4/2832/\\_\\_\\_\\_2.pdf](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page/chinese_attachment_4/2832/____2.pdf)
- [16] 例如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举行的青年占领凯达格兰大道行动 , 反服贸人士透过 Facebook 的“活动组织”功能 , 向约 9 200 人发出了邀请 , 并有约 1 200 人表示参加。12 月 22 日,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以及“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 13 个团体联合举办了“拒绝服贸闯关、立法破黑箱”的抗议活动 , 也同样利用了 Facebook 的“活动组织”功能。
- [17] [28] 陈婉琪 《谁来“学运”? 太阳花学运参与者的基本人口图象》, MSN 新闻 , <http://news.msn.com.tw/news3777463.aspx> 2014 年 7 月 7 日。
- [18] [22] 吴中杰 《史上最大学运推手: 自由网工具》, 《商业周刊》1377 期刊 2014 年 4 月 , 第 34-36 页。
- [19] “乡民”为 PTT 论坛用户的自称。
- [20] 刘己交、薄心宇 《e 世代社运! PTT 乡民“甲级动员”召集挺学运》, 三立新闻网 , <http://www.setnews.net/vote/News.aspx?NewsID=18421&TagID=149> 2014 年 3 月 31 日。
- [21] 陈为廷 《野百合的启蒙影响 太阳花的检讨反思》, 载何荣幸 《学运世代: 从野百合到太阳花》, 台北: 时报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 第 43 页。
- [23] 在线社群“热迪特”网站上的一个版面 , 人人都可以在里面发起一个页面 , 在自我介绍后与网站用户进行开放式的问答。
- [24] Rich Trenholm, “Students Occupying Taiwan Government Take to Reddit AMA” , Cnet.com , April 2 , 2014 , <http://www.cnet.com/news/students-occupying-taiwan-government-take-to-reddit-ama/>
- [25] 共同笔记为一个开放给大众将数据分享并进行编辑的平台。
- [26] 参见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403/342362.htm>
- [27] 曾允盈 《传统媒体失灵 网络“新媒体”时代来临》, 《看杂志》2014 年第 143 期 , 第 42-46 页。

( 责任编辑: 张文生)

##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Xin Qiang , Koo-Fum Kim

**Abstract:** Some Taiwanese students opposed to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 CSSTA ) occupied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March 18 , 2004 , which led to the “Sunflower Movement” that reverberated through the island. As exhibited in the movement ,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ere utilized by the protestors and organizers to disseminate their anti-CSSTA views , construct anti-CSSTA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establish their mobilization network in the hope of getting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support. On the other hand , they tried to raise action resources and giv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upport for the action through new media. Therefore , the new media is undoubtedly believed to have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movemen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its social applications before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its role and imp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vement and the discussion of its inherent limitations.

**Key Words:** new media , social movement ,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 “Sunflower Movement”